

范仲淹掌应天书院 及其教育思想考评

● 杨布生

范仲淹，既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，又是我国书院教育的开拓者。然而，在学术界只注重了他的政治思想的研究，对他的教育思想却有所忽视，很难找到有专题论述他的教育思想的文章。但是，我们单从有关仲淹掌教应天书院的材料及其在教育上的主张看，他的教育思想也是极为丰富的。他不仅开拓了中国的书院教育，而且对北宋官学的兴办，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因此，试作此文，以期对中国的传统教育有所借鉴。

一、范氏的教育生涯与师品

范仲淹（989—1053），字希文，其先居邠州，后徙江南道，遂为苏州吴县人。据《年谱》记载：范氏生于宋太宗赵光义端拱二年己丑。二岁失去父亲范墉，母谢氏，贫无所依，再嫁淄州长山朱文翰。仲淹亦从朱姓，改名说。举进士第后才还姓，更其名。累官知州、参知政事，最后以户部侍郎知青州，充淄潍等州安抚使。宋皇祐四年壬辰春徙知颍州，夏五月二十日至徐州病逝，享年六十四岁。赠兵部尚书，谥文正，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。追封楚国公，并敕赐西京褒贤显忠禅寺、苏州天平山白云禅寺，奉其香火，赐忠烈庙额。

范氏的一生，主要是从政从军，在从政中过问教育，具体从事教育工作的时间很短暂。他只在天圣五年丁卯（1027），丁母忧居南都时，应知府晏殊之请，掌教河南应天书院凡三载。除

此，在参知政事任上，于宋仁宗庆历四年（1044），曾为首发起了北宋时期的第一次兴学运动。这两次的时间虽不长，但在我国教育事业上影响却很大。有的志书称其为“书院之设，始于宋范文正公”（《河南通志·侯方域重修书院碑记》）。这个“书院”是指的全国性的书院，还是指的应天书院，很难判明，但就以应天而论，它也是我

国北宋时代最早建立的“四大书院”之一，与嵩阳、白鹿洞、岳麓三书院齐名。庆历兴学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。北宋开国后，由于多年战乱，学校教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，庠序不修，知识分子多侥幸奔竞于科举场中，无心问学，造成了人才匮乏。庆历兴学后，教育形势大为改观。“其明年（庆历四年）三月，遂诏天下皆立学，置学官之员，然后海隅缴寡四方万里之外，莫不皆有学”，真可谓“盛矣！”（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卷39）《山堂肆业考》甚至说：“至庆历以后，州郡不置学者鲜矣。”这显然是范氏在教育事业上立下的奇勋。

范氏的官品和师品都相当好。全祖望在《高平学案序录》中称其为：“高平一生，粹然无疵，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，尤为有功。”在他一生的仕宦生涯中，曾接二连三地上书议论时政，特别是勇斥权相吕夷简任人唯私，上《百官图》，指名道姓地批评居官者谁为当，谁为不当，力图澄清吏治，不愧是被尊称为“龙图老子”的鲠直清官；他守边多年，选用良将，爱护士卒，招抚流亡，增设城堡，联络诸羌，深为西夏畏惮，传言“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”，相约不敢来犯，堪称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；在政治上，他力主革新，提出了十大改革主张，主持了庆历新政，虽为勋贵旧臣、滥官污吏所阻而失败，但终究不失为赵宋王朝第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改革家；在教育上，他“泛

通《六经》，尤长于《易》，学者多从质问，为执经讲解无所倦，并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，士多出其门下。尝自诵其志曰：‘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’感论国事，时至泣下。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，自先生倡之。”（《宋元学案·高平学案》）

二、掌应天书院与庆历兴学

应天书院（应天府书院），又称睢阳书院、南京书院或范文正公书院。位于河南省商丘县，因院址属应天府治（宋初升宋州为应天府），故以为名。商邱秦置睢阳县，故又称睢阳书院，原址在旧城州治东。它的前身为“戚同文学舍”。其沿革在范氏《南京书院题名记》中叙述得很清楚：“皇宋辟天下，建太平，功揭日月，泽注河汉，金革尘积，絃诵风布。乃有睢阳先生赠礼部侍郎戚公同文，以贲于邱园，教育为乐。门弟子由文行而进者，自故兵部侍郎许公襄而下，凡若干人。先生之嗣故都官郎中维，枢密直学士纶，并纯文浩学，世济其美，清德素行，贵而能贫。祥符中，乡人曹氏，请以钱三百万，建学于先生之庐，学士之子殿中丞舜宾，时在私庭，俾幹其裕。故太原奉常博士渎，时举贤良，始掌其教，故清河职方员外郎吉甫，时以管记，以领其纲，学士画一而上。真宗皇帝为之嘉叹，面可其奏。今端明殿学士盛公侍郎度，文其记；前参预政事陈公侍郎尧佐，题其榜。由是风乎四方，士也如狂，望兮梁园，归欤鲁堂。章甫如星，缝掖如云。讲议乎经，咏思乎文。”书院的首倡者戚同文，何许人？据《宋元学案·高平学案》载：“戚同文，字同文，宋之楚丘人。世为儒。幼孤，祖母携育于外氏，奉养以孝闻。祖母卒，昼夜哀号，不食数日，乡里为之感动。始，罔邑人杨愨教授生徒，日过其学舍，因授《礼记》，随即成诵，日讽一卷。愨异而留之，不终岁，毕诵《五经》，愨即妻以女弟。自是弥盖勤励读书，累年不解带。时晋末丧乱，绝意禄仕。且思见混一，遂以‘同文’为名字。愨尝勉之仕，先生曰：‘长者不仕，同文亦不仕。’愨依将军赵直家，遇疾不起，以家事托先生，即为葬三世数丧。直复厚加礼待。为筑室聚徒，请

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，登第者五十六人，宗度、许驥、陈象舆、高象先、郭成范、王砺、滕涉，皆践台阁，而高平范文正公亦由之出。”

大中祥符三年至七年（1010—1014），仲淹曾在此求学，这是“学舍”的全盛时期。他先居于醴泉寺僧舍读书，“日作粥一器，分为四块，断藜数茎。入少盐以啗之，如此者三年”，继则“处南都学舍，昼夜苦学五年，未尝解衣就枕，夜或昏息，辄以水沃面，往往饘粥不充，日昃始食。”在求学期间，他胸怀大志，常以颜子、凤鸟、青松自比，并作《睢阳学舍书怀》诗一首云：“白云无赖帝乡遥，汉苑谁人奏洞箫。多难未应歌凤鸟，薄才犹可赋鸛鷀。瓢思颜子心还乐，琴遇钟郎恨亦消。但使斯文天未丧，涧松何必怨山苗。”在仲淹掌教应天书院期间，由于他博学多才，办学有方，“训督学者，皆有法度，勤劳恭谨，以身先之，由是四方从学者，辐辏其后，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。”晏殊对他在书院的评价是：“大理寺丞范仲淹，为学精勤，属文典雅，略分吏局，亦著清声……昨因服制，退外睢阳，日于府学之中，观书肄业，敦劝徒众，讲习艺文，不出户庭。独守贫素，儒者之行，实有可称。”天圣六年（1029），服除，仲淹赴任秘阁校理，他对书院非常留念，感叹地赋诗说：“霜露丘园不忍违，三年日月速如飞。金门乍入应垂泪，因挂朝衣忆彩衣。”此后，他对书院仍很关心，数次推荐王洙、张向等人，到应天讲学，还做了《南京书院题名记》一文，追述了应天书院的历史发展。景祐三年（1035），朝廷将书院改为府学，给田十顷。后世为了表彰和纪念范氏办院的功绩，便在府学之东另筑了“宋范文正公讲院”，或称“范文正公书院”。宋钦宗靖康元年（1126），金兵南侵，开封沦陷，书院遂随之被毁。因书院存在的时间不长，在宋代约七、八十年的历史，且屡经兵燹和水淹，遗物已荡然无存。然而它在中国书院史上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，这与范氏在此求学和掌教有密切关系。

仲淹是一贯重视教育，热心办学的。在他掌教应天书院时，就曾“数言兴学校，本行

实”（《宋史·选举志》），并写了一份洋洋万言的《上执政书》，其中就提到了“避选举”和“敦教育”两项建议。他说：“慎选举之方，则政无虚授，敦教育之道，则代不乏人。”庆历三年七月，任参知政事时，进一步提出了改革政治、兴学育材的主张，得到了仁宗的赞赏，并取得了韩琦、宋祁、欧阳修、蔡襄、王素等重臣的支持，同年九月，仁宗召大臣在天章阁议事，他乘机条奏十项改革案：明黜陟、抑侥幸、精贡举、择官长、均公田、厚农桑、修武备、减徭役、覃思臣、重命令。其中抑侥幸、精贡举，就是针对改革科举、大力兴学来的。仁宗将此奏交近臣讨论，博得了宋祁等大臣的热烈赞同，并奏称：“臣等参考众说，择其便于今者，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，则学者修饰焉，先策论，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；简程式，则宏博者得以驰骋矣；向大义，则抱经者不专于记诵矣。”（《文献通考》卷31）最后由欧阳修起草了《颁贡举条制敕》，经仁宗批准实行，由此掀起了北宋第一次兴学高潮。这次兴学，主要内容有二：一是州县立学，并改进太学及国子学，规定应科举者须受相当时间的学校教育；二是改革科举，规定科举考试先策、次论次诗赋，罢帖经、墨义，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，试十道。其具体措施为诸路府州军皆立学，县有士子二百人许立学；教官选本道宿学硕儒充任；士子须在学三百日方得应举。兴学的结果，太学、国子学进行了整顿扩充，地方兴学的积极性大为高涨。范氏在《邠州学记》和《饶州新建州学记》就详细地记载了地方兴学的实况，“其材出于诸生备矣”。特别是他在庆历兴学前，知苏州时，奏请朝廷批准，聘请硕儒胡瑗为苏州郡学教授，并把自己两个儿子纯祐、纯仁送往郡学读书，拜胡瑗为师，远近学子慕名来学者甚多。胡瑗为苏州郡学拟定了严密的学规，以丰富的内容，新颖的方法教授学生，后称“苏湖教法”，使苏州郡学成为当时各地学校的楷模。这也为他后来提倡兴学运动，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。

三、范氏的教育思想及方法

范氏的教育思想，主要反映在他的《上执政书》、《上时相议制举书》、《邠州学记》、《饶州新建州学记》和《南京书院题名记》等文章中。总括起来，一个总的指导思想是“以天下为己任”而办教育，培养人才。他在应天书院掌教期间，无论在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上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，总结了一套自己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。在教育这条战线上，他清醒地看到了教育是封建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其行“王道”、施“仁政”、明“教化”的工具，是为巩固封建制度和昌盛封建文化服务的。因此，他的教育目的论很明确，就是为封建社会“长养人材，材不乏而天下治，天下治而王室安，斯明著之效矣”。他认为“国家之患，莫大于乏人”。意思是人才的培养很重要，关系到国家存亡与王室的安危。至于人才的标准是什么？他认为培养出来的人，要能“服礼乐之文，游名教之地，精治人之术，蕴致君之方。然后命之以官，授之以政”，使他们都具有一种本领，“列于朝，则有制礼作乐之盛；布于外，则有遗风易俗之善”。只有培养这样的人才，“国家以之富盛，基业由是绵昌”。

为了落实他提出的教育目的，培养合乎规格的人才，在教学内容上也有他的安排，这就是以《六经》作为基本教材。他说：“夫善国者，莫先育材，育材之方，莫先劝学，劝学之道，莫尚宗经。宗经则道大，道大则才大。盖圣人法度之言存乎《书》，安危之机存乎《易》，得失之鉴存乎《诗》，是非之辨存乎《春秋》，天下之制存乎《礼》，万物之情存乎《乐》。故俊哲之人，入乎《六经》，则能服法度之言，察安危之机，陈得失之鉴，析是非之辨，明天下之制，尽万物之情，使私人之徒，复何求哉！至于扣诸子，猎群史，所以观异同，质成败，非求道于斯也。”学习《六经》，要抓住哪些要领呢？他认为必须“通《易》之神明，得《诗》之风化，洞察《春秋》褒贬之法，达《礼》《乐》制作之情”，只有如此，才能做到“善言二帝三王之书，博涉九流百家之说”。只有这样的人才，于国家才有希望。他认为当时宋王朝之所以“文库不

振,师道欠缺”,其主要原因是“为学者不根乎经籍”,就是不以《六经》为教学的根本,“从政者罕议乎教化”,就是很少研究教育问题,以致弄成“文章柔靡,风俗巧伪,选用之际,常患才难”的局面。并且他还进一步总结前代经验来说明“宗经”的重要性。他说:“某闻前代盛衰,与文消息,观虞夏之纯,则可见王道之正,观南朝之丽,则知国风之衰。惟圣人质文明相教,变而无穷,前代之季,不能自救,则有来者,起而救之”。最后他总结说:“如能命试之际,先之以《六经》,次之以正史,赅之以方略,济之以时务,使天下贤俊,翕然修经济之业,以教化之心,趋圣人之门,成王佐之器。十数年间,异人杰出,必穆穆于王庭矣。”

在教学方法上,范氏也有较为完整的一套。一是传经有重点,突出《易》学,重视《春秋》,传经先问《易》。他说:“圣人作《易》之大旨,在于设卦观象,尽变化之道,通幽明之故,尽事物之情。”只有学通了《易》,才能了解天地万物、阴阳变化的道理,他认为《春秋》是孔子褒善贬恶,立百世不易之大法的经典著作,也不可忽视;二是提倡独立思考,让学生以自学为主,博览群书,通晓大义,教师只注重启发诱导,经常向学生提问,答错了的则“罚之”;三是制订严格的管理制度,“诸生读书,寝食皆立时刻”,教师要常入学生斋舍,督促检查,遇有违犯者则“诘之”。《记闻》中说仲淹“往往潜至斋舍询之,见先寝者,诘之,其人亦妄对,则取书问之。其人不能对,乃罚之”;四是教师以身作则,做学生的榜样,“出题使诸生作赋,必先自为之,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,亦使学者准以为法”。

四、范氏的艺文教学与成就

艺文是古代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艺文包括诗文书画音乐书法等方面。诗文又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必修课程。在庆历兴学中,就规定了科举考试先策、次论、次诗赋。范氏长于诗文教学,总是带头写示范诗文,把文题自己先作一遍。他在古文和诗赋方面是很有工力的,在

《范文正公集》二十卷中,诗赋二百六十八,文章一百六十五。苏轼为其作《序》,其中对诗文的评价是:“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弟,盖如饥渴之于饮食,欲须臾忘而不可得。如火之热,如水之湿,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,虽弄翰戏语,率然而作,必归于此。故天下信其诚,争师尊之。”由此可见,他的诗文词赋,富于政治和伦理纲常的内容,为社会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现实感相当强,正所谓“作文章尤以传道为任”《晁公武读书志》),如他在应天书院写的《上执政书》,就是一篇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政论文,他披肝沥胆,慷慨陈词,洋洋万言,都饱含了爱国爱民的炽热情感,表现了极其强烈的改革意识,不仅时人读了热血沸腾,就是今人读了也会为之精神振奋。又如最使人百读不厌的《岳阳楼记》一文,更是一篇生动的宣传正确人生观的极好教材。此文批评了一般迁客骚人感霖雨而悲,临春风而喜的患得患失情绪,探求出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的所谓“仁人之心”,堂堂正正地提出了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响亮口号。这充分表露了作者博大坚贞的政治抱负和先忧后乐的人生理想。这句口号一经提出,便成了中华民族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,激励着一代一代的志士仁人为国为民而英勇奋斗。

在艺文创作上,他虽然不以词赋知名,但较早为宋词开辟新意境的他又算得一个。他流传下来的词比赋更少,赋有《明堂赋》、《蒙以养正赋》、《用天下心为心赋》等十三篇,词只有《忆王孙·秋思》、《苏幕遮·怀旧》、《渔家傲·秋思》和《御街行·秋日怀旧》四首。但这四首词大都即景抒怀,表现了开阔而深沉的意境。

〔作者简介〕 杨布生,男,1936年生,湖南汉寿人,1962年7月毕业于湖南师院中文系。现为湖南师大学报副编审,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兼职副研究员,湖南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副理事长。出版论著(含主编、合著)有《岳麓书院山长考》、《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》和《学报编辑学概论》等9本,发表书院学和伦理学论文30余篇。

〔责任编辑 江立中〕